

顏元教育思想山間論

李國鈞 著





2 033 6685 6

6-92/35

顏元教育思想簡論

李國鈞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颜元教育思想简论

李国钧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25 插页 1 字数52,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书号7012·0832 定价0.62元



顏元像

存學編卷一

由道

博野顏元著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揖世
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
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
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
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
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
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濶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
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

顏元的著作《存學編》首頁

目 录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1
二、“致富强”的政治主张与反理学的“勘天”思想	15
三、“生之谓性”说与教育的作用	23
四、培养“经世”的“君相”与“百职”人才	35
五、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及科技教育思想	46
六、教学法理论——“习行”	74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颜元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生于公元1635年(明崇祯八年),死于公元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颜元字浑然,又字易直,河北博野县人。后因其书室名“习斋”,学者称他为习斋先生。

颜元出身贫寒,其父颜昶因家境穷困,无法生活,便去蠡县刘村给朱九祚家当养子。因不堪忍受朱家虐待,于清兵入关时,乘机随清兵逃往关外,从此杳无音信。这时,颜元才四岁。六年后,母又改嫁。故颜元说:“吾四岁失父,十岁离母”,十分孤苦。养祖父朱氏,原为中小地主兼小官吏(蠡县巡捕),因吃官司,“讼后家落”。因此,颜元在青年时期,又为生活所迫,亲身“耕田灌园”,参加生产劳动,并曾学做医生,为人治病卖药,得资以赡养家庭。所以,他的高足弟子李塉在《存治编序》中说:“先生自幼及壮,孤苦备尝。”

颜元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书工作。他二十四岁时,即开设家塾,教授生徒,训育子弟,将其书斋、学舍叫做“思古斋”。当年,他得陆、王语录,深喜而笃学之;二十六岁时,“得《性理大全》,见周、程、张、朱语录,

幡然改志。”^①又笃信程朱理学；及至三十四岁时，由于自己的亲身实践，颇觉理学有“违性情”，“非孔子学宗”，深信“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认为理学“伤身害性”，空虚无用，便立志“矫枉救失”，转变学术思想，从“穷理居敬”、静坐养性，一变而为崇尚“习行”，把“思古斋”改为“习斋”，以示决心与理学决绝。颜元自己叙述这一思想转变的经历时说：

“予初从陆、王入手，继见性理周、程、张、朱之书，又交先生（指刁包），遂专主程朱，莫谓闻诋毁伊川、晦庵者怫然怒，但闻朱陆互有长短者，亦怫然怒。尝称周元公真圣人，朱文公真圣人，不惟举诸口，亦已笔之书。迨读朱子语录，有云：‘江西顿悟，同甫事功，断却两路，方可入道。’遂疑二子必是异端，此时虽有以二家书进者，必揜而不观矣。惟戊申遭丧后，忽觉程朱非孔子正派，始思二家书。以朱学大行，二家高阁，求之十余年，得《象山全集》于陈太守家，得《龙川集》于肖扶沟家。乃知赵氏运中，学术原有此三派，皆非周孔旧道也。然使文达（陈亮谥“文毅”，此系颜元讹误）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朱、陆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道如此。”^②

①《习斋记余》卷六：《王学质疑跋》。

②《习斋记余》卷六。

颜元思想转变后，认为程朱与陆王俱同“镜花水月之幻学”，“亦禅宗虚局而已”。他说：“朱学盖已参杂于佛氏，不止陆王也；陆王亦近支离，不止朱学也。”^①他离程朱之学，亦不归陆王，而却趣向事功派，走上反对整个唯心主义理学的道路。

颜元三十九岁时，由蠡县回博野县归宗，教书于杨村。三年后，来学者日众，他始订教条二十则于学舍，称《习斋教条》。其条目为：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勤赴学、慎威仪、肃衣冠、重诗书、敬字纸、习书、讲书、作文、习六艺，行学仪、序出入、轮班当值、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②在这个“教条”中，贯串着对诸生的知识技能教育与道德规范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道德不徒说教，而是重道德的实践、品行的陶冶、纪律的加强和生活常规的制度化；在知识技能传授方面，特别提出了“习六艺”一条。根据规定，学生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之学。其课程表是：每日午前检查诸生课业，之后开始讲新课，不解者，可“反复问难”，要求“潜心玩味”经义及古今文字；午饭后习字，“教演笔法”；每月逢二、七作文，要求“用心思维、题理通畅”，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习御则以骑术和技击代替。颜元的《习斋教条》，每遇节令必给诸生读

①《习斋记余》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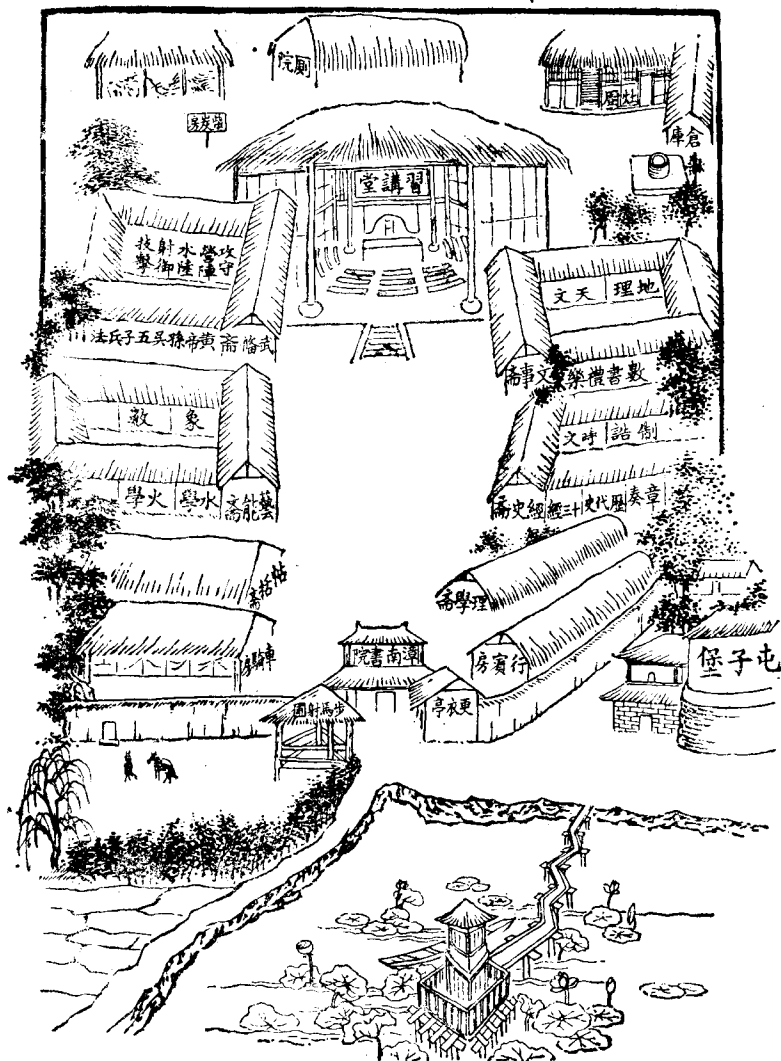
②《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讲，又每“有新从游者，必读讲一次”。颜元四十一岁时申订的《习斋教条》，是反映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颜元六十二岁时，在今河北肥乡县主持漳南书院，虽时间不久，却是他教育活动史上的一件大事。颜元曾亲自设计了漳南书院的建筑计划，这个计划充分反映了他晚年的教育思想。现依照他的《漳南书院记》^①，绘图如下：

颜元为了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以便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方面进行试验，亲手拟订了一套规模宏伟的建校规划，院中建正厅三间，名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名曰“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名曰“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孙武、孙臆、吴起等五家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二斋，西向，名曰“经史斋”，教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名曰“艺能斋”，教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上悬“漳南书院”匾额。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以上六斋，斋有长，科有领，而统贯之以“六德”、“六行”。“理学斋”及“帖括斋”皆北向，表示与周孔正学之敌对，暂时设置，一方面是适“应时制”之需要，另一方面表示“吾道之广”，书院具有博大

^①《习斋记余》卷二。

圖意示院書南漳



包容的精神。等“时制”已改，学风不变，即废此两斋，原“理学斋”以处僦价，“帖括斋”以宿来学。大门外左腋房六间，榻行宾；右腋厦六间，容车马。“习讲堂”的东北隅为仓库、厨灶，西北隅积柴炭，后为厕所。院门前，东一斗室，名曰“更衣亭”，“凡客至，通僦、拂洗、更衣、一茶，乃入”；西为步马射圃，上筑小亭。

从颜元漳南书院的叙记中可知，学校的设施和体制相当完备，院设有院长，斋设有斋长，科设有主任。书院里除建有大礼堂、教室之外，还设有宿舍、食堂、仓库、浴所、会客室等，特别还设有运动场。在教学内容方面，他把水学、火学、工学、天文学、地理学、兵法、射御、技击等均列为教学的科目。学生每天除“读书作文如常课”外，还得按时习礼、歌诗、学书计，并进行举石、超距、击拳等体育训练。亦时常“讨论兵农”，“辨商古今”政事之得失。所有课目的学习，均贯其“实用”、“实习”的主张。当时弟子数十人从学，其教学原则，是专务一“实”字。他说：

“顾儒道自秦火失传，宋人杂释老以为德性，猎弋训诂以为问学，而儒几灭矣。今元与吾子力砥狂澜，宁粗而实，勿狂而虚。”^①

“宁粗而实，勿狂而虚”，这不仅反映了颜元教育思想的特点，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

^①《习斋记余》卷二：《漳南书院记》。

颜元主办的漳南书院，因漳水水患，被毁，历时仅四月。但表现了颜元大胆的创新精神，在教学设施、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包含有近代教育的因素。他的《漳南书院记》，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意义上来看，是第一幅反映新兴市民阶层某些要求的学校蓝图。

颜元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弟子遍天下，现有记录可查的，尚有一百余人。其中汉族学生居多，也有满族人从学。学生的成分亦很复杂，有中下级官吏及其子弟，也有布衣、商人及农民垦荒者。就年龄来看，有几岁的蒙童，也有比他年纪大的七十老翁。其教育对象不分种族、贵贱，颇有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正因为颜元教育的对象有儿童、青少年、成人和老人，故其教育经验全面而丰富。

由于颜元学术思想的转变，使他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也大异于传统。因而，诸生中多才多艺的人很多，有研究经史的，有精于数学的，有研究天文、地理的，有研究农田水利的，有长于兵法骑射的，等等。他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冲破了历来的学校以《四书》、《五经》为“定本”的积习，而且别开生面；在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也多种多样，别具一格。他除开设私塾和主办书院外，还到处游说讲学，结交师友弟子，一时拜颜元为师者甚多。当时，有一位名叫王学诗的，初求颜元为师，不许，王生则“长跼两昼夜以请”。颜元说：

“吾恶夫世之徒师弟子名而无其实者。”后来，知道王生却有志于学，于是便收为弟子。当时，士子学者，“善其学，欲师事之”者甚众，有的在颜元死后，还“正弟子礼”，师其门下。这反映了颜元的“新学”已深入人心，为一般士子所喜闻乐学。因此，他当代的学者曾总结说：“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①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他的学说是适应时代要求的，而且也预兆着其“道之敌对”学派，为封建主义服务的程朱理学的衰落。

颜元在教育上的事迹很多，教育教学工作也很成功，归纳起来，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学生“坚定其志，不畏流言”

在《颜李弟子录》中，记载着这样两个故事：有一次学生问颜元，“寻师问道，人多非者如何？”他对诸生说：今“天下方以时文为正业，别有所学，则见为怪，”“汝须坚定其志，不畏流言”，抛弃科举八股之文，批评程朱理学，“闾然自进”，乃学能有成。颜元自己，十一岁时曾“学时文”；十六岁时，养祖父因热衷科举，曾为他“谋贿入庠”，他则“哭不食，曰：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②并认为经科举八股培养出

^①《恕谷年谱》卷五转引陶甄夫：《奏关稿序》。

^②《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来的士子，多为“废人”，“若不作秀才，只废八股业耳，未为废人。”^①从此，颜元遂立志废举业，而专心研究国家兴衰之迹，学习生民休戚之事，真是废寝忘食，终于开辟了一代“实学、实习、实用”的经世致用之学。由此可知，他教育引导学生的，也正是他自己所走过的路。就是要弟子们不卖身求荣，射名取利；不做“钱谷不知，甲兵不知”，而“志在利禄”的腐儒俗吏；要专心“实学”，以做“经邦救世”、康济时艰的“转世人”。又有一次，一位年近七十的老翁，“执摯就教”，拜颜元为师，颜元试之是否持志有恒，便对他说：“学人未见真诚如子者，惜老矣！”老翁对曰：“竭力以进，死而后已，敢言老乎？”颜元见他意志坚定，就收了这个老弟子。后来，他曾跟颜元步行南游讲学。因为他们为学之志真诚坚定，又持志守恒，所以均能学有成就。

（二）严格要求

颜元要求弟子言行一致，对于他的学说，要“信于心”、“习于身”，力行实践，不务空言；在道德方面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个学生，冬天“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室近，欲取之，思之不可，而远取已薪。”颜

^①《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吾辈》。

元听到弟子这一“善行”，第二天到学舍，当着弟子们的面，鼓励他说：其行，“充此意，可以作圣矣。”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要求诸生发扬这种不自私的精神。同时，又对诸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1）“暗室不欺”。不“阴私”自己，闭起门来做坏事，也不因无人知道，而欺骗别人；对于他人的“恶习”、坏行为，不但不包庇，且要“扬人暗昧之失”，善意帮助，与坏人坏事作斗争。（2）“义利分明”。不要为自己一时的方便，为一己之私利，而失去“道义”，丢掉原则，要分清“义利”，端正言行。他主张义利结合，求“义中之利”，动机与效果统一。他说：

“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利者，义之和也。……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①

要求做到“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义利既分明而又结合，才是诸生行动的准则。（3）“举念能断”。一个思想念头的出现，是善是恶，都直接支配着自己的行动。因此，自己判断自己思想的好坏，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入进步与否的关键，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所以，颜元十分注意培养弟子们判断自己思想和行动好坏的能力。从这个教育故事中，可以看到颜元很善于做思想工作。

①《四书正误》卷一。

(三) “因人质性”，各尽所长

在颜元的弟子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其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因材施教，不拘一格育人才。其弟子中，“有勇力”者，则教之骑射技击诸艺；有志于抗击清贵族统治的“抗节不仕”者，就教他们学习兵法；而学礼、学乐、学书、学律、学数等，都是颜元根据诸生的“材质”和兴趣而定的。所以，他说：“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①均尊重诸生个性的客观实际，以各尽其材，故人才辈出。弟子中甚至有能“手制小仪器，业者自谓弗如”的能工巧匠冯壅，有善于垦荒种田的农技人才齐林玉等。

(四) 讨论德业，“规过辨学”

颜元经常同他情投志合的师友弟子讨论学业，劝善规过”。他同弟子们常有定期约会，辨学论业，砥砺德行，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如与王法乾“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②又如

①《四存编》：《存学编》卷一。

②《恕谷年谱》卷一。